

论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

[作者] 刘伟

[单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摘要]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有其形成的特定背景，其基本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它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并由此形成有关生财、聚财和用财等一系列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研究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对于搞好我国当前的财政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科学价值

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背景

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从国际上看，中国北面的苏联，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就一直面临着同时与德日两国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法国败降后，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危险日益严重。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苏联当时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尽力避免或推迟日苏战争。为此，苏联大力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利用中国的抗日战争束缚日本的手脚。斯大林在对援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崔可夫部署对华使命时明确指出，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其决策无疑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大影响。在苏联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相应地提出了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把中国作为其北进苏联和南下南洋的战略基地，从经济上控制中国，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必须把发展经济、充实财源作为保存自身、坚持抗战的基本财政方针。由于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日本侵华逐渐力不从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于是日本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英美为把侵略祸水引向苏联，也怂恿国民党投降，国内出现了一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逆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主张国共团结抗日，一方面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渡过难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也被拖下水，客观上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推动了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互相援助与配合。毛泽东又提出在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外援的财政方针。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毛泽东的财政思想逐步产生。

除了国际大环境，国内形势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开展政权与经济建设，积累了一定的财政工作经验。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是他土地革命时期财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抗战的爆发促使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日民族矛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号召“一切为了抗日”。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共再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加上长期遭敌顽封锁、分割，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财政困难异常突出。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款及国民政府的抗日报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困难，边区财政靠“外援”度日，于是毛泽东提出“合理负担”、“休养民力”的思想，财政基本处于无税或轻税状态，与民休息，医治战争创伤，鼓励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 1940 年前的财政主要靠外援。据统计(元)：

| | 全部岁入 | 外援金额 | 外援占收入 |
|-------|------------|------------|--------|
| 1937年 | 526302.45 | 456390.01 | 86.71% |
| 1938年 | 907943.31 | 468506.00 | 51.60% |
| 1939年 | 6620909.88 | 5664667.34 | 85.55% |
| 1940年 | 9750995.31 | 7550855.04 | 77.43% |

[摘自《毛泽东财政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7页。]

抗战初期，利用“外援”的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这一政策并不能长久。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外援不断减少，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肆进攻，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祸天灾，祸不单行，与此同时，边区广大军民长期对“外援”的依赖心理依然存在，忽视了发展生产。这一切的直接后果便是1940—1941年的严重财经困难，正如毛泽东形容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军政机关规模增大而外援断绝，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和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并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2]于是，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由于根据地处于农村的特殊环境，而抗战的主体，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毛泽东始终坚持“农业第一”的方针，以农业税作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办财政。为了克服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克服边区分散的弱点，做到“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毛泽东主张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而各抗日根据地实质上是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稳定货币”和“平衡出入口”的思想。在这些财政思想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沿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总方针指引的道路前进，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也逐渐形成并逐步成熟。

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它涉及到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不是用一两句话就能全面概括的。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

1. “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一切为了抗日”

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和抗战的全面爆发，毛泽东指出：“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3]“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战胜日寇。”[4]新的财经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经济破坏作斗争为目的。在毛泽东这一财政思想指导下，边区政府实行“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边区人民以高度的抗日热情，踊跃交纳救国公粮，他们说：“公粮不算少，但八路军要吃，不吃饱怎么打仗？就更多些，我们也要办到。”对此，毛泽东说，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但要对人民的事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否则就“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5]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发展工业。毛泽东指出，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在《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7]毛泽东提出的战时财经政策，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的基础。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8]这是毛泽东思想在财经工作实践基础上的重要理论概括。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在根据地，我们必须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9]

第一，正确把握经济与财政的关系，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重要内容。

首先，发展国民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了解财政与经济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这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核心。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强调，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10]毛泽东把发展生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之一，他说，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无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11]这深刻地阐明了经济与财政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中，陕甘宁边区除1944年略有超支外，1943和1945年两年均有盈余。盈余数分别占预算收入的0.5%和3.52%。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只有生产发展才能充裕财政的道理。

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12]这是一种积极的理财思想，它着眼于开辟财源，扩大收入的基础；不是消极等待经济的发展，而是要积极推动经济发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大力发展生产才能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开辟源远流长的源泉。为此，毛泽东要求广大党政军干部学会领导经济。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他指出，中心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说同志说来，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对于这两大任务来说，生产尤为中心之中心。因为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其他一切问题。

其次，不能忽视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财政问题是国民经济问题的综合反映，财政政策的好坏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好的财政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反之，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甚至扼杀经济发展的活力，破坏现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财政必须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增加财政收入而阻碍经济发展。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要制定“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办法”。[13]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财政对经济的重要影响。

强调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的同时，也要反对单纯财政观点。毛泽东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毛泽东认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错误的方针。[14]就必然会阻碍经济发展，把财政引向绝路，最终使财政陷于无法摆脱的困境。

第二，在公私关系上，应坚持“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我们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毛泽东说，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是财经问题的决定点之一。[15]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是精力不至于枯竭。1942年12月，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

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才能增加生产，推动边区经济发展。1941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强调，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第一是农业），公营为辅。公营经济在边区经济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但公营经济也是边区的领导力量。正如任弼时所说的，各种公营企业如果能够依据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处处从全体人民（包括自己在内）利益出发，那它就自然在150万人的生产与消费中起组织与调节的作用。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帮助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如果公营经济继续发展，人民的负担可以减轻，民力也可以得到休养。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只有军民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丰衣足食。边区的党和政府，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军民兼顾”的方针，调动军队与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有力地推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争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由此可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二、坚持合理的财政收支原则，推动边区建立“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

第一，生财的思想

1. “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为了恢复民力和发展经济，采取了“休养民力”的方针，努力争取外援，以外援来支持边区的财政。这种外援也促使边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极大地休养了边区的民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1937年至1939年，这一方针取得了基本的成功。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

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解决财政问题，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认真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

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1939年2月，当边区的经济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中指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他说，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这就是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军队的生产自给，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达到最后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毛泽东在1945年4月9日写给郑位三等人的信中说，你们除粮食外，其他用费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16]这些财政经济政策，使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步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正轨，各边区的生产自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三五九旅五年来的生产自给状况为例，见下表：

三五九旅五年来生产自给状况

| | 1940年 | 1941年 | 1942年 | 1943年 | 1944年 |
|-----------|-------|-------|-------|--------|--------------|
| 经费方面 | 56.5% | 78.5% | 90% | 91.3% | 全部自给 |
| 四年来粮食方面自给 | | 5.3% | 10.4% | 全部政府发给 | 全部自给(做到耕一余一) |

[摘自《毛泽东财政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8页。]

财政出路的中心是加紧生产与建设，以求自给自足。毛泽东曾自豪地说，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一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是财政工作乃至立国的基本方针。

2. “农业第一”

开展生产自给运动，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毛泽东指出，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适合于我们所处的农村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农村中做经济工作。

农村和农业是边区整个经济的基础，也是主体。这个特点决定了边区的经济仍然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经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的《陕甘宁边区简政施政纲要》指出，目前政府工作必须集中力量于急要和首要的任务，首先是农业生产。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基本重心应放在发展农业上。[17]1942年12月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后毛泽东说，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边区政府依据他的指示确定了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的方针，从此，边区的经济发展，开始了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开辟了在乡村中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的大道，边区逐步进入了“丰衣足食”的阶段。与此同时，边区把组织劳动力作为发展农业的中心工作。于是，各种各样的劳动互助合作形式在边区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也涌现了一批模范的劳动互助合作组织。这些劳动互助合作组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3.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原则”

大生产运动成就的取得，除了来源于贯彻毛泽东“自力更生”和“农业第一”的思想外，与财政体制的合理调整也有直接关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是大生产运动的体制保障，它既坚持了原则性，又兼具灵活性；可以有效地防止或减少各自为政、苦乐不均、乱收乱支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同时也调动了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积极性。毛泽东说，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统一领导下的分散经营是保障供给行之有效的体制，它适应了根据地分散、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需要。其核心是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为此，毛泽东在 1945 年给鄂豫皖边区领导人的信中写道，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能够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人意。“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18]

第二，聚财的思想

1. “政府的财政应放在合理负担及有钱出钱的原则上”

合理负担、休养民力的思想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财政经济工作理论和实践中。从革命的目的和长期性出发，必须爱惜民力、休养民力，为此在财政上就要实行合理负担。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政府的财政应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19]他说，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等。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承袭。他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同时，毛泽东还提出稳定农民负担的问题，稳定负担实际是减轻税负。他指出，在公粮以外的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即增产不增税。

通过下面表格中的数字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利用抗战初暂时的和平环境休养民力，蓄积了很大力量，从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边区 1937 年至 1940 年救国公粮

| | 粮食产量 | 计划数 | 实收数 | 计划征粮占产量 |
|-------|-------|-----|--------|---------|
| 1937年 | 126万石 | 1万石 | 13859石 | 0.79% |
| 1938年 | 127万石 | 1万石 | 15972石 | 0.78% |
| 1939年 | 137万石 | 5万石 | 52250石 | 3.64% |
| 1940年 | 143万石 | 9万石 | 97354石 | 6.29% |

[摘自《毛泽东财政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7页。]

2. “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农业税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的主要收入。抗日根据地的税收充分体现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在保证抗战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在1940年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税收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20]这说明，在存在阶级的条件下，各阶级的负担也要合理，同时这也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在财税政策中的体现。

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21]统一累进税是根据地税制的一大改革，体现了“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合理负担原则。由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对极贫困者应予以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的经费。[22]这一规定是毛泽东税收思想的充分体现。我党在抗战时期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政策，保证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如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941年为13.61%，1942年为10.67%，1943年为11.25%，1944年为9.17%，1945年为7.8%。陕甘宁边区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统一累进税能够更好地贯彻合理负担的政策，更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用财的思想——“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少花钱多办事从来就是对财政工作的要求。在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之后，讲合理负担主要是确定合理的收入限度，而节省主要是讲财政支出原则。早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23]毛泽东“节省”思想的涵义是广泛的，它包括：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和实行经济核算制。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历来主张精兵简政。他指出，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24]我们要实行的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因为，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经济。精兵简政为克服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它和发展生产并行实施以克服财政困难，是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

厉行节约是抗日根据地解决财政困难的又一个法宝。毛泽东的厉行节约思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在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始终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一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25]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倡议，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约，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当然，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中，节约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生产和节约并重”，它和生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26]在毛泽东的节约思想指导下，边区节省了大量的人财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建立经济核算制是毛泽东厉行节约思想的具体运用。厉行节约的基本原则是：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急务急用则力求节约，合理安排，尽可能减少财政开支。于是，毛泽东指出，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至经常因资金可能妨碍生产。第二，每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据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没有工厂应有节省原料和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27]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成为根据地公营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的行动准则。

三、充分发挥“平衡出入口”和“稳定货币”等金融、贸易政策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1. “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

为了同日寇作长期的斗争，毛泽东认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为了支付抗日的浩大军费支出，他认为，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关于边区的货币发行，毛泽东认为应坚持三个原则：第一，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第二，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包括货物（特别是工业品）、伪币和法币。第三，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这是问题的中心。因为，他对抗战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绝之可能。杂币更会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1939年，由于外援的断绝，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的财政陷入极度困难，金融物价产生了剧烈的波动，摆在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外汇（法币）的管理，以稳定金融物价，并保护和发展生产。[28]而在边区，争取“外汇”的主要武器是食盐，于是，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财政思想采取公盐代金的办法，大量地回笼货币。由于取得了相当多的“外汇”，支持了边区银行的“外汇”基金，相当地稳定了边区的金融。1941年毛泽东致信林伯渠、谢觉哉，提出，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此时不与斤斤计较。在毛泽东货币金融思想的指导下，经过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努力，边区自己的货币终于站稳了脚跟，在支持边区的财政、支援边区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 “平衡出入口”

毛泽东认为，贸易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开了它，或对它采取了错误的方

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阻碍。他说，边区应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所以，进出口的平衡，即贸易的平衡对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对外’贸易上的方针是‘平衡进出口’”，[29]以解决因外援断绝、国民党经济封锁而造成的进出口不平衡问题。食盐是平衡边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武器。毛泽东指出，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进出口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及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指出，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进出口平衡问题。1941年，毛泽东在研究财经问题的过程中指出，平衡进出口是解决财经问题的决定点之一，“达进出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再加上发展经济，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进出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进出口平衡”思想是新中国外贸进出口平衡思想的前身，对我国的外贸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阻碍。

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科学价值

1. 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历史价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战之初，毛泽东提出“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这一战时财经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人、财、物等资源服务于抗战，保证了抗战所需的物质供给；“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公营经济，则从源头上解决了军政费用的来源问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毛泽东又从根据地处于农村环境的这一最大实际出发，提出“农业第一”的方针，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口号，鼓励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了农业经济。在从人民取得财政收入时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实行“统一累进税”，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阶层共同抗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组织财政支出时，要求厉行节约，尤其是实行“精兵简政”，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和政府工作效率，同时减轻了人民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在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这为我党解放战争中在大城市接管企业提供了经验。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适应了根据地分散的特点，正确处理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充分发挥了各根据地协同作战的优势。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是贯彻毛泽东财政思想的伟大实践，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财政思想的正确性。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不仅有国内价值，更具有国际价值。“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边区广大军民在毛泽东财政思想指导下壮大了自己，削弱了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无疑会给其他寻求民族独立的广大反法西斯国家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使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更加巩固。

2. 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理论价值。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它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既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继承、延续和发展，又为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毛泽东财政思想的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其开拓性还体现在它是邓小平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源泉，邓小平经济思想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发扬光大。总之，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经理论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财政思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财政建设的理论前提。

3. 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现实价值。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厉行节约”的经济建设和财政建设思想，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它强调开源节流，保持收支平衡。“农业第一”的方针，凸显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有利于推动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实行“合理负担”，注重减轻农民负担，强调“兼顾”，合理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合理，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不谋而合。同时，推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对当前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今天进行财经工作的客观环境虽然不同于抗战时期，财经困难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于抗战时期，但我们目前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财经困难的实质是不变的，毛泽东财经思想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毛泽东财经思想的科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财政分配的一般规律，不会因经济形式的变化而失去作用，因而它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然，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要发展，而且必须发展。这是因为这一思想毕竟产生于那个特定的时期，有其自身特殊性和环境适用性，因而在运用它指导我国当前财经工作实践时，要在坚持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灵活运用。毛泽东财政思想也要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4][8][11][12][14][18][21][24][25][26]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880,891, 892, 911,930, 1105, 1064, 881,896,1020.

[2][7][15][27]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66,369,366,463.

[3][5][19][20]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8,349, 376,767.

[6][9][13][16]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6,241,185,280.

[10][23]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

[17][28][29]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 [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118,457,456.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 [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